

第一篇 基础篇——正确认识 我们的时代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将围绕对于当今时代的认识这一中心议题，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去观察和分析我们正在亲身经历的这场深刻变革，看一看今天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些什么事情。虽然这些问题似乎是一些比较枯燥的理论问题，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正确的行动来源于正确的认识。为了在这个新时代中有效地工作、和谐地生活，首先就需要完成一系列基本观念的转变，建立起对当今时代的科学的、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的讨论就从最基本的“应知”——对当今时代的认识开始。

第一章 向信息时代过渡——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

1.1 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变动之中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时期，即相对稳定的时期和剧烈变动的时期。在相对稳定的时期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的生活方式处于稳定的状态之中。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人，基本上过的是同样的生活。从祖父到孙子，一代又一代人用的是同样的工具，做的是同样的工作，住的是同样的房子，过的是同样的生活，按着同一个模式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当然也必然是按着同样的模式和标准去看待世界、判断是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曾经经历过上千年的这种类型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中，社会并不是不发展、不变化，而是处于量变的阶段。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中。然而，社会并不会总是处在这种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从世界范围来看，现在的社会都已经进入了剧烈变动的时期。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近一百多年来，社会一直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动。近半个世纪的变化则更是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料。1957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曾经讲过如下一段话：

“我们现在是处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03页）

从那时算起，四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确实经历了剧烈的变动，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1957年有谁能具体地预见到这四十年中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呢？对比起来，20世纪50年代的变动只不过是序幕和前奏。

需要指出的是，这场大变革不仅仅只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席卷了全人类。在欧洲历史上，在希腊罗马的繁荣之后，经历了一千多年相对稳定的、停滞的历史时期（这和中国在春秋战国以后的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有某种类似之处，它们都是上面所说的、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基本上没有质的变化的发展阶段）。

从大约三四百年之前的工业革命开始，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就开始大大地加快了。以蒸汽机的应用为标志，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冲破封建制度的重重束缚建立起来，相应的政治和思想的变革席卷欧洲和美洲，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时期。然而，即使在这三四百年（一般称之为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中，至少在一代人或几代人的时段内，还可以保持某种相对的稳定性，例如，某些行业（如纺织、石油、机械、冶金）在一二百年内的骨干行业的地位，某些地区（如鲁尔区、匹兹堡、曼彻斯特）在几代人的时间内的中心区域作用等。从而，也就会产生出相传数代的财阀家族和血统工人

家庭。相对而言，社会和经济的体制还是比较稳定的。

人类社会真正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全新的历史阶段，是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的。据统计，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技术中，百分之九十是在这五十年中发明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技术与设备的更新席卷了几乎所有的行业和领域，从冶金工业的高炉到机械工业的机床，从秘书的打字机到家庭用的洗衣机，从会计的记帐方法到印刷排版的技术，都从根本上彻底地变了，都变得与以前根本不同了。“日新月异”四个字，如实地描述了这五十年来实际情况。如果说，以前人类社会的变革还是在地区和国家的框架内进行的，还可以分得出欧洲和亚洲、东方和西方的话；那么，这五十年来变化，则已经无法区分了。全人类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动的、充满质的变化的、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近年来，国内外已经有许多书籍和文章对于人类社会的大变动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例如，著名的《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对于这半个世纪来的大变革，人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角度，尽可以持不同的观点，有成百上千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一点恐怕是不会有歧见的了。

对于中国来说，由于文化大革命及在此以前的社会政治环境，在一段时间内置身于这场大变革之外。然而，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之后，国门打开了，从经济到思想、文化，中国迅速地投入了这场大变革之中。二十年来，无论是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上，还是在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上，中国与世界的差别已经大大缩小了。闭关锁国、自处于世界之外的局面已经被彻底地打破。现在，我们谈论大变动的时代，已经很难把中国和世界分开了。当今世界，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已经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件事本身在人类历史上就是前所未有的。

总之，我们决不能用传统的、社会处于量变阶段形成的思想、观念、理论、方法来看待今天的社会，来作为今天的企业的经营理念。我们需要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新的观念和方法，需要在对这个全新时代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确定我们做事、办企业、搞经营的方法。理由很简单，今天的时代是新的、与以前不同的大变动的时代。

需要强调的是，这场大变动决不是局部的、表面的，而是全方位的、非常深刻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变化是最明显不过的。人类的衣食住行与半个世纪之前相比，无论在构成、质量方面，还是形式方面，都已经变得几乎无法辨认了。文化生活的变化也许更能体现出变革的深刻。电视、电影、流行歌曲、电子游戏给青年一代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今天的孩子所读的、所听的、所唱的、所玩的和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已经完全不同。很自然，他们对于各种事物的评价标准和思考方式，也必然会出现巨大的差别。如果我们转向各种工作场所，这种变革同样处处可见。会计手中的算盘已被电脑代替；秘书起草文件也已经不必靠手抄写；印刷行业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和电”；工厂中大量的手工抄表和手工控制，变成了自动化仪表和计算机控制。人们的工作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原有的岗位和职业消失了，一批新的岗位和职业涌现出来。各级各类的管理工作也发生了许多变化。由于信息管理手段的改善，一些中间环节不再必要。层次的减少、信息周转的加速、工作节奏的加快，使得管理机构面临着比生产岗位更为尖锐的变革，管理体制和方法的改变已经势在必行。从更大的范围来看，经济的全球化、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量增加、全球环境与气候的变化、国际关系的新格局，也处处表现出与几十年前大不相同的情况。据统计，目前在一些沿海城市中，已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有直系亲属在国外生活或工作。所有这些，都通过各种方式影响

到每一个普通人的工作、生活和思想观念。

上述的种种情况都是众所周知的。它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我们的周围发生和发展着，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加以重复。然而，正如我们天天所见到和听到的，人们对于这些现象的看法和态度是五花八门、分歧极大的，而且由此引出了许许多多的矛盾和冲突。这表明，对于这些现象进行客观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只有对当今社会变革的根源、动力、趋势和影响进行具体的、实际的深入研究，才能从中得出符合实际的认识，从而制定正确的对策。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直到我们的祖父或父亲这一辈，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和外国人）还都是几代甚至十几代人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用同样的工具，进行同样的生产活动，按同样的方式生产和生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不久前。因此，普遍存在的对于这场大变动思想准备不足，一些人陷入困惑和迷茫，许多地方出现冲突和矛盾等现象，实在是非常自然的，不足为怪的。如果没有这些现象出现，倒将会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1.2 新技术革命——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空前提高

我们所说的这场社会变革是如何引发的呢？简单地说，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和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是这场变革的最基本的推动力。社会进步从根本上说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的。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首先表现为生产力水平的空前的、加速度的提高。

生产力发展中最基本的、最突出的标志是生产工具的变革。恩格斯曾经对于工具的使用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重要分水岭之一。从第一把石斧开始，人类就开始超越大自然对自己的能力的限制。一切动物，不管它们跑得多么快，力量多么大，感觉多么灵敏，本能多么精巧，都只不过是利用了大自然赋予的能力。然而，只有人类能够利用“身外之物”，去达到自己的体力所达不到的目的。

比如，当人用手无法砸开坚硬的贝壳的时候，就想到利用石块加以敲击；当石块的刃不够锋利的时候，就会加以磨制，使它更加好用。最初的工具就是这样产生了。当我们使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等术语时，显然已经把工具的使用水平作为时代的标志了。

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人类的生活当然必须依赖于各种物质财富，因此，最初的工具都是和物质财富的开发、加工和处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到，最早的石斧、骨针标志着人类走出蒙昧，古代的文明开始出现。随后弓箭、鱼网出现了，它帮助人们从事渔猎，获取食物。农业的产生离不开一系列农用工具的出现，犁、锄、耙、磨等工具表明了人们在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的各个环节上不断的进步。尽管这些工具十分简单，沿用了成千上万年。然而，它们的出现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的里程碑。所有上述这些，构成了今天我们称之为农业时代的漫长的历史时代的根基。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甚至在我们至今知之甚少的拉丁美洲，都可以看到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古代文明的遗迹。

另一个社会要素——能量的利用方式而同样也伴随着工具的进步的发展。火的利用，无疑是人类古代文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事件。钻木取火至今仍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仅对人类的饮食和御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标志着人类开始利用自然的化学与物理变化达到自己的目的。畜力的利用同样也是人们利用“外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畜力不仅

用于运输和移动物资，同样也用于加工物质财富，如用畜力推动石磨等。此外，风力、水力的利用也属于这方面的进步。水车和风车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能源。当然，人类对于能量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古代还只是处于零碎的、局部的状态。真正自觉地、大规模地利用自然界的能量资源，则始于工业革命，蒸汽机就是其主要标志。处理和加工物质资源的工具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必然涉及到能量的获取。人的体力是很有限的，要想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就必须为加工物质财富的工具找到“外来”的动力——某种大规模的、便于开发与使用的能源。从马车到蒸汽机推动的火车，从手摇的纺纱机到用蒸汽机带动的珍妮纺纱机，人们在科学技术帮助下，迈出了从古代文明到近代文明的关键步骤。从蒸汽机开始，电动机、发电机、内燃机陆续问世，直到核能的开发与利用，在几百年内，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步。与以前的成千上万年相比，这确实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大跃进。

然而，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相比，近代的产业革命的发展则还是缓慢得多。信息技术，以及与信息的加工和处理相关的工具走向社会发展的前台，是近半个世纪的事情。然而，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已经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以至于信息时代、信息社会的说法已经广为流传，尽管它们深远影响还只是刚刚显露出来。

作为处理信息的手段，信息技术早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就已经存在了。结绳记事和信鸽传书，就是最早的例子。在后来的几千年中，算盘曾经是人们进行数据处理的主要工具。当然，文字和印刷术更是数据信息处理的基本手段。在近代还出现了基于机械原理的手摇计算机。然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由于整个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物质财富的极度缺乏，信息的问题一直是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因而有关信息处理的工具和技术手段也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和关注。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和阶段性的。正像在三四百年前，有关能源的技术和工具走上前台，成为时代的标志一样，今天的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势，已经把有关信息的工具和技术推到了前台，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焦点和中心。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今天的水平，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已经成为关键。一个重要的事实正在被人们逐步认识，这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上的土地资源、物质资源，以及石油煤炭等能量资源是有限的。人类要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改变以前那种粗放的、掠夺式的发展模式，这就提出了更为理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实际要求，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科学地、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这就使得处理信息的技术与工具，成为社会各方面所关注的热点。

大量事实表明，信息技术的应用使人类的生产能力跃上一个新的高度。数控机床代替旧式机床，使得金属加工的效率与精度大大提高；全球定位系统使得任何地理上的距离不再成为发展生产和人们交流的障碍；现代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全球范围的、精细的分工合作成为可能；而计算机的普及，则使得各种范围和尺度上的资源优化配置真正得以实现。所有这一切，使物质财富与精神产品极大丰富，从绝对数量和整体来看，人类已经不再像前辈那样，需要为温饱而终日操劳。尽管存在着许多原有的和新出现的问题，这一百多年来，人类的生产力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当然，新技术革命的内容十分广泛，现代信息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除了信息技术之外，其他方面的新技术同样也为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这主要包括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交通技术、生物技术、环境保护和海洋开发技术等方面。

例如，能源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核能和太阳能的利用，为各种生产活动提供了几乎是取

之不尽的动力。同样，新材料的合成，使人类基本上摆脱了“靠天穿衣”的局面；飞机、汽车、高速公路，使人们的交流方便快捷。所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生物技术是新技术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以至有人说目前的知识经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而下一时代的知识经济将以生物技术为标志。的确，生物技术不仅可以对于农业、畜牧业、医疗等许多方面产生直接的效益，而且由于涉及了生命和人类本身，所以影响更为深刻也更为敏感。最近克隆技术所引起的争论，就预示了未来的、更大的冲击波即将来临。当然也应当看到，目前有关生物技术的许多问题还在探讨和研究之中，不论是从技术本身来看，还是从相关的社会条件和环境来看，都还有待于今后一个时期的继续发展。然而，生物技术今后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则是毫无疑问的。随着人类对于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深入认识，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技术在近年来也有了迅速的发展，成为新技术革命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从开始时亡羊补牢式的治理，逐步发展到今天全面的、立足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建设，人类正在摆脱那种竭泽而渔式的、落后的开发模式，这应当说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从对热带雨林的保护，到冰箱致冷剂的更替，从化肥农药的更迭，到汽车尾气的治理，围绕着环境保护这一主题，一系列技术得到了研究与发展，一系列新的产业涌现出来。与此相关，人们已经开始把目光从几乎开发穷尽的陆地转向占地球表面积百分之七十的海洋，寻求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正在成为科学和技术一个新的发展点。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总之，今天面临的社会变革，其动力来源于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主要代表和标志的新技术革命。这一事实再一次生动地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佐证。我们在分析和看待五光十色的社会现象的时候，必须记住这个基本观点。

1.3 新技术革命引发了社会的全面变革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历史唯物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被近几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再一次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如果只看到技术的变革，而忽视由此带来的社会的其他方面的、全面深刻的变革，显然还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这场大变动不是局部的、表面的，而是全方位的、极其深刻的。前面已经提到的种种变化，如文化生活的变化、管理方法和体制的变化、娱乐方式的变更等，从根本上说，都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生产力迅速发展而产生的后果。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这场变革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因为目前单纯从技术角度去看待这场社会变革的情况还是相当普遍的。

技术的进步显然是生产和物质生活变化的基础。没有收款机和条形码，遍布大小城市的超级市场就不可能出现，而这样的变化又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购物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改变。20世纪50年代被视为珍品的人造棉和化学纤维，今天已经成了最普通的材料。汽车不但在发达国家已经普及，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已开始进入家庭。随着交通的发展，种植技术的更新，普通百姓的饮食习惯也在变化之中。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在饮食起居方面的差别正在缩小。不管走到哪里，同样的旅馆装修，同样的麦当劳快餐，同样的可口可乐和壳牌广告，往往使人不知身在何处，这种深刻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技术和物质生活的范围。

文化生活的变化同样离不开新技术。电视、电影、电子游戏都是基于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就说流行歌曲吧，没有现代的电子乐器和传播渠道，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流行歌坛。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流行歌曲所反映的思想和情绪，其中许多也正是人们在新时期的迷惘和彷徨。由于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人们得到的信息成千倍地增长。然而这究竟带来的是明白还是糊涂、幸福还是痛苦，似乎还说不清。可以肯定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又一个潘朵拉盒子正在被打开，飞出来的将是什么，谁也无法确切地预先说明。

在各种截然不同的领域中，深刻的变革都正在静悄悄地，然而却是不可逆转地进行着。会计手中的算盘被电脑所代替；文字处理软件已经成为秘书的必备工具；从纺织女工、车工到排字工人，工作方式都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一些岗位和职业消失了，另一些新的岗位和职业不断涌现出来。

以上这些情况和现象是大家都见得到的。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往往存在单纯从技术方面去考虑的倾向。人们常常简单地看待这种影响，只看到它带来的直接的、技术层面上的效益，而不是从更深的层次上去理解和认识这场变革。由于这种情况，人们常常对伴随着新技术革命而来的一些社会现象，特别是一些过渡期间的不协调和负面影响缺乏思想准备，陷入迷惘，甚至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技术进步产生怀疑和抵触，主张倒退和复古。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生产关系就必然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形成新的、符合新的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否则生产关系就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和压制的反面作用。依据这样的基本观点，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和普及，无疑将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格局和相应的上层建筑产生影响。实际上这种影响已经开始显示出来。如果我们用孤立的、形而上学的观念把这些现象割裂开来，那么就不避免地会陷入被动的、无法找到出路的困境。

总之，决不能用单纯技术观点去看待和认识信息化的进程，这在理论上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在实际中也是不符合当前的社会现实状况的。我们必须把信息化看作是一场全面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认真地研究与分析它的社会影响，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认识信息化和信息社会，更不可能在信息社会中有效地生活、工作和发展。

1.4 为什么我们的时代被称为信息时代

在现代科学技术中，现代信息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不只是因为信息这个要素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重要，而且还因为它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与其他技术融合在一起，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按照一些专家的见解，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素是物质、能量、信息。物质是基础，能量是动力，而信息则是社会经济系统赖以组织协调的纽带，是正确调度、合理配置的依据。经济交流的范围越大，分工越精细，交流越密切，信息和信息处理的重要性就越突出。如果信息这个要素发挥作用，安排合理，调度得当，那么用同样数量的物质和能量就能得到更多的效益，为人类创造更多的福利。反之，信息不灵，处理不当，

就会造成物质和能量的巨大浪费，不仅不能为人类造福，有时还会造成人为的灾难。在生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的今天，信息和信息处理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为各级管理者所认识。因此，现代信息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的效益，不是局部的、某一方面的，而是全局效率的提高，全局状况的改善。

信息技术之所以特别重要，另一个原因是它与其他技术的密切结合，从而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中。人类的任何社会活动都包含某种信息的传递和处理。顾名思义，社会活动就是人与人类共同完成的工作，而不是作为生物的个体的、单独的活动。因此，任何社会活动都包含着信息的采集、传递、存储、加工处理、解释、提供等活动。而这正是信息技术发挥作用的领域。例如，农业生产需要收集气象信息，应用信息技术中的遥感遥测技术，农业生产技术就如虎添翼。工业生产线上需要按预定的设计要求，准确地控制与操作，基于计算机的数字控制技术能比人工更有效更准确地控制与操作，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图书馆为科研人员迅速有效地从成百万的数据中查找所要的资料，计算机在这里同样成了提高效率的有力助手。如此等等。

由于上述两方面原因，现代信息技术已成为这场科技革命和社会大变革中最引人注目的标志。正因为这样，人们对于这场大变革冠之以“信息革命”的名称，把未来的社会称为“信息社会”。这确实是很合适的。

关于现代信息的概念和范围，需要略加说明。广义地说，凡是人帮助收集、传递、存储、加工、显示信息的技术手段，都是信息技术。从古代的结绳记事，到算盘、手摇计算机、电报、电话、广播、电视以至文字纸张，都属于信息技术的范畴。可以说，信息技术是自古以来就存在和发展着的。而成为信息时代标志的是以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为中心的、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各种技术，统称为现代信息技术。除了计算机之外，光纤通信、卫星通信、微波通信、遥感遥测、缩微技术、复印和现代印刷技术等都属于这一范围。由于计算机体积越来越小，并且与其他技术结合在一起，出现了许多光电一体化、机电一体化的新型设备，所以确切地定义信息技术的范围是不大容易的。这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信息化的深刻和广泛。

以上这些情况和现象是大家都见得到的，不会有什么争议的。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决不能用单纯技术观点去看待和认识信息化工作，这不仅在理论上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也不符合当前的社会现实状况。我们必须把信息化看作是一场全面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认真地研究与分析它的社会影响，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认识信息化和信息社会，更不能在信息社会中有效地生活、工作和发展。

第二章 新经济——信息时代的经济基础

2.1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

经济关系是人类社会所有关系的基础。社会的变革归根结底是经济关系的变革。就像在起伏不停、变化万千的大海上，虽然最容易看到的是此起彼伏、绚丽多姿的浪花，然而真正决定潮流的却是隐藏在深层的洋流。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政治事件和文化现象引人注目，然而最根本的却是人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是基础”。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也已经一次又一次地为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所证实。因此，对于我们面临的社会大变动的深入分析，还应当从经济关系的变化谈起。

什么是经济？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人们是怎样分工合作进行生产活动的，又是怎样分配劳动成果和财富的？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群体，其根本差别就在于人组成了社会，而不是自己单独地与自然环境打交道。有些动物，如蜜蜂和蚂蚁，也形成某种群体，因此被称为社会性动物。然而，它们的分工合作是为本能所驱使的、盲目的、被动的。而人类的分工合作则是主动的、自觉的。正是由于这个差别，人类才能超越其他动物，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发展文明，成为万物之灵。虽然就个体而言，人的力气远不如大象，人的视力远不如鹰，跑得比马慢，嗅觉没狗灵，然而就总体而言，人类却能超越这些动物，处于支配的地位。其原因就在于人类可以作为一个整体，通过有效的分工合作，做成其他动物做不成的事，并且作为一个整体，把知识和经验积累起来，继承下去。这就是人类的特别之处。

循此思路考虑下去，人类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这种有效的分工合作的呢？这里有些什么需要我们认识的规律？为什么有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得快？有的时期则发展得比较慢，甚至停滞、倒退以至崩溃？为什么有的地区、有的民族在一定时期会突飞猛进地发展，而另一些地区或民族则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研究和认识，这就是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要回答的问题。所以，经济学并不是像有些误解所说的，是挣钱经商的本领，而是人类对于社会发展与运动规律的基本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里，我们不妨引用一段经典的定义。

由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主编的《经济学》一书，长期被奉为经典的教科书，多次再版，影响极大。在这本书的一开头，作者就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

“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资源来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的供消费之用。”^①

显然，经济学无疑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基础学科之一。它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

近代意义下的经济科学起源于亚当·斯密。虽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古代学者都不乏对于经济规律的精辟见解和机智论述，然而，这些往往都是片断的、零散的，而且散见于无所不包的科学或哲学之中，没有成为系统的、完整的、独立的学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创了近代的、科学的经济学说的先河，第一次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价值、分配、货币、贸易等基本的理论问题，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框架。特别是他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观点，至今仍是许多经济学派和经济政策的基石。从亚当·斯密开始，经过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的发展，经济学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学科群，它既包括了对经济活动各个侧面的深入研究，也包括用不同的方法与手段、从不同的角度对经济规律的研究和观察。到了20世纪中期，以新古典主义的形式，经济科学的综合已近完成。

然而，近二三十年来，一系列新的经济现象出现了。传统的经济管理理论遇到了一系列的挑战。而对许多新问题、新情况，经济学界不无遗憾地发现，理论预测常常和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不测事件与意外事件总是出现。人们刚刚归纳出了关于经济周期的数学公式，以为能够定量地预测经济中的周期现象，现实就开了一个大玩笑，用美国经济连续超过一百个月的持续增长，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经济系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于“东亚奇迹”的赞扬声还在耳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又令人目瞪口呆。类似的事例还可以举出许多。

经济系统和经济科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理论与实际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为什么这二三十年中，经济学中的新名词特别多，变得特别快？难道几百年来，人类对于经济的研究竟还不足以回答许多最基本的问题？

回到本书的主题，原因就在于我们正处于一个剧烈变革的历史时期，在于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特点。几百年来，人类对于社会的认识，包括对于经济系统运行规律的认识，无疑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认识和理解成为制定政策的基础，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确实在这几百年的人类进步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今天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果中，包含着人类科学的巨大贡献，这里所说的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也包括经济科学、管理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这是毫无疑问的。

问题在于，世界是在发展变化之中的。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进展，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在全球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包括经济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前面几节，我们已经从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等方面简单地描述了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大变革。这种变革对于人类社会与经济的影响正在逐步体现出来。生产关系必然将随着生产工具的更迭而发生深刻的变化。无法想像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新一代，还能够按照“小而全”、“自给自足”的方式去组织生产和进行社会活动。一句话，情况和环境变了，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

近年来，关于经济的新名词特别多，如“知识经济”、“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直接经济”、“无磨擦经济”、“注意力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不一而足。关于这些充斥于媒体的各种提法，我们不在这里进行比较和评价。但是仅仅这种情况本身就表明了这样一个实际上大家都承认的事实：经济学需要新的观念和新的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学者使用的“新经济”一词，倒是一个既聪明又省事的办法。因为“新”在何处，尽可以各自大加发挥，而不必事先把自己束缚在某一个特定的视角上，因为“变”和“新”是大家公认的。

那么，到底“新”在哪里？我们认为，最突出的变化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 生产社会化程度的空前提高；

-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分工的出现；
- 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相应的应对方法得到迅速发展；
- 知识、信息和信息系统作用的不断加强；
- 创新的作用更加突出；
- 管理体制、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的变化。

正是这些变化，使我们今天面对的经济系统在许多方面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面对的经济系统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当然，也必然有基本的不变之处，什么变，什么不变，正是需要我们加以研究的）。面对这些变化，首要的问题是正确地、客观地认识它们，然后才能得出应当如何去做的正确结论。在以下几节，我们将具体地分析这些变化的情况。

在详细讨论之前，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对于“经济”一词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指特定的经济体系、经济格局，如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等。它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技术手段与工具的支持下，具有与其他经济不同的某些特点的经济体系。我们这里所说的新经济，就是指当前正在兴起的、基于新技术革命的成果的、带有 21 世纪时代特点的经济体系。另一种理解则是指某种经济思想或经济学说，例如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它是指从一定的视角，对于一定的问题方面提出了一种理论体系。例如，信息经济学就是从否定“完全信息假设”开始，从信息的不平衡、不对称出发，对经济现象和规律进行重新认识的一个经济学的分支。这里主要是从前一种理解进行讨论。

下面将分别对于这六个方面的变化情况，进行较为详细的讨论。

2.2 生产社会化程度的空前提高

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是描述人们生产方式发展水平的一个概念。前面讲到，人类区别于动物，就在于其自觉的、主动的分工合作。如果生产的大部分成果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享用，那么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就很低，因为他对于社会的依赖程度和贡献程度都很低。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人主要还是一个自然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基本上作为个人面对着大自然的，其能力与动物相比，并没有多少提高。当原始的人类面对险恶的环境条件时，最初的分工合作就出现了。一方面，共同狩猎的部落开始形成，为了对付猛兽或追逐猎物，人个体显然不如联合起来力量大。另一方面，男耕女织的家庭形成了，性别之间开始分工。近年来考古学的进展，使我们对人类早期的文明有了许多新的认识。许多证据表明，部落与家庭中的这种最初的分工，对于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是起了根本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分工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文明的发展程度。人类社会就是这样逐步发展的，从部落发展到民族，进而发展到国家和城邦，一直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高度分工、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

为什么分工合作如此重要呢？为什么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能够大大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呢？这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在数学上，当把事物的质的方面暂时抽掉的时候，一加一等于二是毫无疑义的真理。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情况则是另一回事。根据系统科学的观点，总体大于其各部分之和。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在现实世界中，当若干部分以某种互补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一加一就会大于二，就会产生新的质（当然，也存在着一加一小于一的情况）。因此，不能用简单的算术加法来看待分工合作，而应当注意到由于分

工合作带来的质的变化。从实际情况的观察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分工，许多工作的机械化、自动化才有可能实现：正是由于分工，各种专业技术才能得到深入的研究与发展，才能精益求精，不断提高效率。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经历，每一次新技术的诞生，都必然带来人类社会新一轮的重新分工。例如从狩猎到养殖业，再到种植业，人类从以渔猎为主转到以农耕为主，这是古代人类曾经经历过的一次最早的“产业革命”。这个变迁过程中，弓箭骑射让位于耕作技术，许多人必须“下岗”或“再就业”（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因为转变的时间太长，这里所说的“改行”的主要不是个人，而是一个部落或一个民族）。在这个转变中的种种冲突与矛盾，我们今天只能在希腊传说和东周列国志中依稀地感受到。今天有确切资料记载的，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当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珍妮纺纱机出现的时候，传统的男耕女织式的家庭内部的分工形式，被专业化的纺织工厂打破了。旧的分工合作方式已经无法继续下去，大批农民进城当了工人。他们也许还是在纺纱织布，但是这时候已经不是为自己使用，而是为社会提供商品，而劳动者自己则用纺纱织布挣来的工资购买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问题还不止于此。工人到纺织厂工作与自己在家工作不一样，他并不是从头到尾去从事从纺纱到织布的每一道工序，他只是专门从事其中某一个工序，例如整理、粗纺、精纺等中的某一项。因此相对于从前在家里的“全能”式的工作，进入工厂以后的工作变得“简单”了或者说“单纯”了。这样一来，他可以集中精力研究这个环节的技术，并且把它机械化、自动化，达到以前作为孤立的人无法达到的高效率和高质量。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就是这样逐步提高、逐步发展的。马克思也正是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这一转变过程，而提出了他的理论体系，写成了著名的《资本论》。

当然，在马克思的时代，所谓的社会化生产，其范围不过是在西欧和北美的局部地区。其规模不过几十人、几百人，行业也主要是在纺织、冶金等行业中。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虽然生产规模有所扩大，行业有所增加，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口还处于这个市场之外，仍然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生活。

然而，近几十年来，情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大批人口进入了国际分工和世界大市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大批国家迅速进入了国际经济的统一市场，以其资源、市场和人力大大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跨国公司陆续出现，区域经济集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人类第一次真正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分工合作的经济统一体。如此规模的生产社会化不但马克思的时代没有，即使在 20 世纪上半叶，也是无法想像的。

由于这种变化，每一个人都更紧密地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更大程度地依赖于社会；同时，每一个人的行动也更直接地对社会产生影响，每一个人将有更大的自由和能力，去参与或干预社会生活。只要看看电视和电话的普及率，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之巨大。

在近半个世纪来的中国，对于生产社会化问题的认识，曾经有过许多曲折和误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曾经以为“小而全”、“大而全”的模式是最安全、最有效的。其要害之一，就在于没有认识到分工在人类进步中的作用，没有认识到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是进步的标志。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散了在这个问题上的迷雾。从 1978 年开始，封闭的状态被打破了。当我们打开国门的时候，看到的是生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的、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世界各国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投入了这新一轮的分工。而我国改革开放的一

系列重要政策，例如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为中国投入这一轮新的分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环境。

对于分工问题的误解还来自对于合作与平等的误解。人类社会分工越细，人和人之间互联系也就越紧密，相互的依赖程度也就越大。这一点常常被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我们一提到分工，就想到分级或分等，就想到冲突和矛盾，就想到了高低贵贱，就想到斗争哲学。分工的基础来自于互相的依赖与需要。正因为不分别做，有许多事情根本做不成，正因为“团结起来力量大”，正因为“一加一会大于二”，人们才需要分工合作，才会走上生产社会化的道路。

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场争论：工人该不该要求增加工资。有一些人认为同样的一锅汤，并不会因为大家的勺子都变大了，而得到更多的汤，所以增加工资的要求是没有意义的。反对者则驳斥说，现在的问题在于资本家的勺子太大，而工人的勺子太小了。请注意，双方的共同点，即讨论所涉及的隐含的前提是：这锅汤的总量是固定的。他们争论的是这固定数量的财富应当如何分配。然而，一个半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锅汤的数量并不是固定的。合理的分工、有效的合作将使这锅汤的数量大大地增长。增长出来的财富是生产社会化的成果。如果非要问它是谁创造出来的，回答只能是共同创造出来的。分工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在没有对方参与的情况下，独自地创造出这些新增加的财富。这里所说的分工，包括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分工，各种行业与专业的分工，以至国家、地区的分工。看来，以阶段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至今仍是我们正确看待分工与合作的思想障碍。^①

分工与合作的前提是信用与信任。分工与合作的发展必须伴随着信用机制和环境的逐步建立。从物物交换到货币的使用，正是建立在普遍的、对于纸币的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一个从未见过纸币的原始部落的人，决不敢相信得到的这几张纸就能够从市场上换回各种东西，而会坚持要实物而不是货币。同样地，今天的电子商务中我们也看到了对于电子货币心存疑虑的种种类似的现象。

以上涉及到的种种议题，都是围绕着生产社会化这个中心问题的。不论从全世界来看，还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这几十年来，我们都亲身体会到了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现实情况。

2.3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分工

如果只是一般地讲生产的社会化，那就还没有充分表达出当今时代的特点。人类文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生产社会化方面的特殊情况与特殊问题。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在这方面的特殊性在于：首次形成的、覆盖全球的统一的大市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们目前所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就是指这种新形势。

关于这个问题，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和发展就是一个最直接、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表现。

关于这场争论可以参阅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文。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49~20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是关贸总协定（GATT）。它的正式运行是从1948年1月1日开始的。GATT的成立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复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复兴经济的沉重负担成为各国政府必须优先考虑的、最紧迫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中，一方面物质财富与人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另一方面，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交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也空前地增加了。随着联合国的建立，人们迫切需要在经济方面也进行广泛的合作。战争中的交往（不论是同盟者还是敌对者之间）使相互的了解加深了，使人们认识到经济上交流与互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正是在这种客观需要的推动下，GATT开始酝酿。

最初的议题是从关税问题开始的。关税历来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主要杠杆之一。各国通过关税，有选择地、有目标地吸取自己所需要的国外资本与稀缺资源，同时保护和发挥自己的有关产业。这正是一种国际范围的分工。在这里，前面的关于生产社会化的讨论可以得到具体的、形象的体现。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各国的国内市场是政府的主要依靠和关注点，对外贸易只起着支撑和拾遗补缺的作用。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是很低的。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经济复苏，各国之间必须进行合作，所以各种双边的、多边的贸易与关税的谈判十分频繁。由于涉及的国家越来越多，许多问题牵涉到一系列国家，因此，建立一个多边的、统一的国际贸易环境，一揽子地解决国际贸易与税收的各种问题，成为迫切的客观需要。GATT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经过几年的酝酿，1947年末正式形成了GATT协议，并于1948年1月1日开始执行。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经济格局的一次意义深远的大变革，就此揭开了序幕。这五十多年中，各国围绕国际贸易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大量的谈判与协商、历经了充满曲折和起伏的七个大回合。然而，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成立了专门的常设机构，GATT变成了WTO，协定所覆盖的范围也从货币贸易扩大到了服务、信息等各个方面。它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影响与作用也越来越大。仅举两个数字就可以看到这个总的趋势。这五十年来，国际贸易的数额不断扩大，五十年中增长了五十倍。与此同时，各国关税的总水平不断降低，从百分之四十降到目前的百分之六，某些方面正在走向零关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由此可见一斑。

为什么在国际贸易磨擦不断，各国之间为了经济利益打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WTO不但没有解体，而且还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呢？这就叫做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无论各国之间如何矛盾重重，以至兵戎相见，历史发展的方向必然是走到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共存局面。如果想把国门关起来，拒绝国际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也只能是痴人说梦，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关于“国际分工”，我们曾经把它作为帝国主义（包括社会帝国主义）的口号加以批判。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国际之间的分工是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时的必然现象。1999年11月15日，在一场漫长的、充满戏剧性的、艰苦曲折的谈判之后，中国和美国终于就中国加入WTO的问题签署了协议。全世界为之震动。为什么这件事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呢？原因就在于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终于向进入全球一体化的、统一的大市场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人们为之感到振奋，是有充分理由的。在这一个时期里，新闻界用得最多的词汇是“双赢”，还有的说是“三赢”。不仅中国和美国都将从中得到长远的利益，而且世界经济也将从中得到稳定发展的动力。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新的经济格局对于世界局势的深刻影响。如果不是这样，就根本无法解释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在那么多历史

情结悬而未决的前提下，在双方各自面对内部强大的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双方最高层为什么要力排众议，迈出这关键的一步。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充分反映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

在这方面的观念转变是十分深刻的。在很长的时期内，我们曾经把“万事不求人”当做富国强兵的必要条件。每当我们自豪地宣称我们造出了“自己的”某某产品的时候，每当我们以“填补国内空白”而感到骄傲的时候，在有意或无意之中，我们已经接受了一种传统的观念：只有什么都自己制造，才是最可靠、最安全、最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方针。不久前，一些新的提法出现了：“是不是所有的空白都需要填补？”这确实是令人深思的。如果这个转变不真正实现，并且贯彻到我们的指导方针之中，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进入世界市场。一些资源和其他条件远不如我国的国家，通过建立外向型的经济结构，在短短的十几年、二十几年中创造了高速发展的奇迹，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与思考吗？

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的时候，社会环境的影响是比较小的，“自力更生”、“眼睛向内”的观念是适宜的、有效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这些方针的确发挥了作用。然而，情况是在迅速变化的。当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已经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把目光转向更大的范围，正确认识我们自己在这个大环境中的位置。

至于“受制于人”的担心，也需要在这样新的国际环境条件下去重新认识和考虑。实际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在经济走向全球一体化的时候，受制于是相互的。一定的分工合作关系的建立，总是导致契约双方的相互依赖，任何一方总是要在某个方面或某种意义上“受制于”另一方。如果完全没有这种制约，那就等于说，某一方可以完全不顾另一方的利益而自行其是、为所欲为，那就等于根本没有合作的必要，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分工合作关系的建立。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在新的国际分工的格局中，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同时也是全球经济的灾难，受害的并不仅仅是这个国家或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根本利益并不在于把其他的经济体系整垮。在这里分工就蕴含着合作。这并不是哪一方发善心，而是根本的共存关系决定了其行为模式。这就是所谓“双赢”的含义。

当然，这样讲决不是说在国际的政治和经济交往中可以掉以轻心，不讲策略或者任人摆布，更不是说不要考虑国家与民族的权益。在这方面，对方的处境也是一样的。中美签订协议后一个月举行的西雅图会议期间，美国国内反对中美协议的势力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这表明，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利益权衡都是十分复杂的，需要非常谨慎地加以分析与处理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客观的现实，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

2.4 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新经济环境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和风险大大增加。当然，在经济生活中，不确定性和风险从来就是存在的。然而，在传统的经济学中，人们总是努力寻求平衡和规律，希望通过利用一定的数学工具与方法，准确地预测和控制经济发展的趋势，甚至具体的数量指标。然而，近几十年来，各种预测方法似乎都不灵了，经济学家的预测总是与现实相去甚远，经济科学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在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使人们在观察经济生活时总是难以摆脱完全确定性的模式。一旦有不确定的因素出现，似乎就违反了常规。至今在许多场合，不确定性还是被当作不正常的、必须避免和消除的坏东西。这种观念是我们在面临新经济时代，需要重新审视和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实，关于不确定性的问题并非只在中国困扰着人们，从世界范围来看，人们对于经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一直抱有不同的认识与态度。受到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物理学的深刻影响，在这几百年中（即所谓近代科学的时代），人们常常把科学与确定性等同起来，而试图把不确定性排除在科学考察的范围之外。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只要考虑不确定性，就会给迷信和神学留出空间（事实上恰恰相反，绝对的确论才是把科学引入死胡同，陷入不得不求助于上帝的歧途）。这种思想在经济科学与管理科学中，则反映为忽视人的主动性，把经济系统等同一台机器的观点与方法。

对于这个问题的重新认识开始于 20 世纪初。正当自然科学领域由于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的创造性工作，而突破绝对的确论的时候，经济科学中也出现了新的思想与观念。著名的经济学家 J. 熊彼特在 1912 年就提出了“创新”假说。他认为，经济活动中如果没有创新，就不会有发展，纯粹均衡状态下的循环是不会导致经济与社会的前进的；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外在的不确定性。在这里，不确定性首次被赋予了积极的作用，而不是被认为只有消极作用的、破坏性的因素。这应当说是经济学思想的一大进步。F. 奈特在 1921 年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则进一步把对不确定性的有效处理作为企业利润产生的基础。他认为，利润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凭借自己的经验、智慧作出正确决策的企业家因此而获得的收益。而这种利润也是他承担的不可保风险的代价。管理科学与计算机科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同时获得诺贝尔奖和图灵奖的 H. 西蒙，则把对不确定性的处理看作是管理者的基本任务。他认为：“管理就是决策”，而决策就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从多种可能的方案中作出正确的选择。从这点出发，他创立了被称为“决策学派”的管理科学新学派。

的确，如果世上的一切发展变化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如果一切不确定因素的产生仅仅是因为我们掌握的信息不完整，如果每一个路口都没有岔岔，都只有一个方向可走，那么还要管理者做什么呢？人还有什么用呢？这个道理似乎是很明显的。在现在的新的环境中，我们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改变近代科学和计划经济的习惯思维方式。

第一，承认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永远无法消除的现实。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是客观事物的固有的两个方面。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不确定性，而只保留确定性。

第二，认识到不确定性并不只起消极的、破坏性的作用。正是由于存在着不确定性，才有发展，才有创新，才有进步。不确定性在造成风险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正是不确定性的存在，才为企业家和管理者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

埋怨环境变化，抱怨条件不确定，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用处的。类似的这些情绪只能表明我们自己还没有从计划经济的思想牢笼中完全解放出来。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以前不那么突出，而现在变得十分引人注目了呢？这又要回到我们的出发点——大变革的时代上来。

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不确定性和风险比以往显得更加突出。这在历史上是并不是第一次。例如，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初期，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通往印度航路的开通，带来了大量的机遇，然而也带来了许多风险。历史记载表明，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不少冒险家，无论在航